



经济管理学术新视角丛书

ON UTILITY AND CHARACTER
—THE STUDY ON JOHN MILLS UTILITARIAN VIEW OF CHARACTER

功利与品格

——约翰·密尔的功利主义品格观研究

钟小燕◎著



经济管理学术新视角丛书

ON UTILITY AND CHARACTER
—THE STUDY ON JOHN MILL'S UTILITARIAN VIEW OF CHARACTER

功利与品格

——约翰·密尔的功利主义品格观研究

钟小燕◎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功利与品格——约翰·密尔的功利主义品格观研究/
钟小燕著.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7-5096-5297-8

I. ①功… II. ①钟… III. ①功利主义—研究 IV.
①B82—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95731 号

组稿编辑: 杨 雪

责任编辑: 赵喜勤

责任印制: 司东翔

责任校对: 王淑卿

出版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A 座 11 层 100038)

网 址: www. E-mp. com. cn

电 话: (010) 51915602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mm×1000mm/16

印 张: 13.5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96-5297-8

定 价: 49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由本社读者服务部负责调换。

联系地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 (010) 68022974 邮编: 100836

前 言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但是，民众的精神世界并没有自动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而丰富，特别注重安身立命的中国人普遍生活于一种富足的不安中，人们提着无处安放的自我在人群中游荡，老人倒地该不该扶，孩子被撞该不该救，门前积雪该不该扫，路有他人丢失的物品该不该捡，捡后该交给谁，等等，这些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竟然成为当下中国人的两难选择，也拷问着每一位中国人的良知。民众不仅生活于富足的不安中，而且生活于痛苦的不安中，其幸福指数和获得感并没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增加。人类到底能不能获得幸福？个人幸福和他人幸福的关系如何？幸福究竟如何实现？等等，这些问题困扰着穹顶之下的每一位中国民众。幸福是人类的不懈追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产生于工业革命前期的英国功利主义学派就明确提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功利主义的核心目标，生活于工业革命盛期的这一学派的集大成者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又译为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就对工业化进程中物质财富增加和幸福实现、个人幸福和他人幸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系统而深入的思考。在密尔那里，“功利”和“幸福”这两个概念往往表达着相同的含义。密尔深刻地洞察到“幸福”不仅包括物质层面的幸福，而且包括精神层面的幸福；不仅包括个人的幸福，而且包括社会的进步；不仅包括个人的幸福，而且包括



所有相关人员的幸福。实际上，他更加强调的是后者，即精神层面的幸福、社会的进步和所有相关人员的幸福。密尔在对工业化、机械化所导致的精神世界的贫乏、公共精神的缺失、“多数人的暴政”和“集体的平庸”等影响幸福实现的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在自由的环境中经由品格培养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功利主义的核心目标。

由此可见，本书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就理论意义而言，对密尔功利主义品格观的研究开启了其功利主义思想研究的一个新维度。在伦理学领域，虽然功利主义是与道义论和德性论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的伦理学流派，但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和关注远远落后于对另外两种伦理学流派的研究和关注。不仅如此，曾大大提高了他那个时代的精神高度、对他的尊敬已经成为人类自尊的一个要素的密尔作为功利主义学派的集大成者，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从 20 世纪 50 年代才开始对其思想进行研究，这距离密尔去世已经约有 80 年的时间。西方国家学术界对密尔功利主义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与功利学派创始人杰罗米·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之间的关系、功利和自由的关系、功利和正义的关系以及密尔对功利主义的证明等方面，功利和品格的关系这一贯穿其思想始终的重要内容尚未被西方学术界充分挖掘和研究，这就无法把握密尔思想的全貌。实际上，关注人类思想道德修养的提高，是他所有作品的出发点，他对人类的影响与其说是智力方面的，不如说是道德方面的。在我国，虽然密尔的两部重要著作《论自由》与《功利主义》分别由严复先生（严复把《论自由》意译为《群己权限论》）和唐钺先生翻译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但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对功利主义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其研究主要集中于功利主义的历史发展梳理、道义论和功利主义的比较研究、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功利思想的挖掘、介绍西方学者对功利主义的研究等方面，功利与品格关系这一贯穿于密尔功利主义思想的一根主线尚未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也就是说，除了梳理和挖掘中国伦理思想史上蕴含的功利主义内容，我国学术界基本没有突破西方学术界对密尔思想的研究范围。就实践意义而言，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社会进入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社会转型期，社会生产力获得了飞速发展，市场经济和民



主政治的加速转型对民众的影响是深刻的、全面的，人们生活于传统和现代、利益和情感的困惑与交织中，旧的价值观尚未完全消失，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新的价值观尚未完全建立，道德领域呈现多元和失范的特点。如何使民众的“德”厚到可以承载快速增长的物质财富和驾驭急剧的社会转型，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改革的成败和现代化的顺利推进。密尔生活的时代恰好是英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时期，和我国当前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基本相同。密尔所论述的工业革命时期英国民众的精神危机和道德缺失等问题和我国民众当下的状况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他所论述的品格培养的环境和途径不仅有助于提高他那个时代的精神高度，而且对我国民众的品格培养以及提高思想境界、提升民众的幸福指数具有重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概述

功利主义是在西方乃至全球影响巨大的一支伦理学流派，时至今日，它仍与道义论、德性论一起形成伦理学领域三足鼎立的局面，即使是功利主义强有力的批判者罗尔斯也认为“在现代道德哲学的许多理论中，占优势的一直是某种形式的功利主义”（约翰·罗尔斯，1988）。18世纪的英国法学家杰罗米·边沁创立了旨在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学说并且不遗余力地把这一理论付诸实践以同当时的贵族政治和特权政治相抗衡，故边沁可被视为功利主义的奠基人。进入19世纪，边沁所创立的功利主义已经不能解答处于工业革命盛期的英国社会所遇到的问题，边沁的追随者詹姆斯·密尔的儿子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修正和发展了功利主义并形成了完备的体系，故约翰·密尔可被视为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

实际上，密尔不仅是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而且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一位转折性人物，因为他那本被R. W. 利文斯称作“伟大的小书”的《论自由》把自由从免于政治压迫的政治自由转向免于社会大众、社会舆论专制的社会自由或个人自由，从而实现了旧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过渡，故乔治·霍兰·萨



拜因视密尔为“十九世纪中叶最令人心悦诚服的自由主义者”（乔治·霍兰·萨拜因，1986）。然而，密尔在伦理学和政治学领域的地位并非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崇高和不可动摇。功利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就招致无数反对，甚至由于对快乐的追求而被人讥讽为“猪的学说”，反对者认为密尔的思想缺乏原创性和逻辑性，内容混乱不堪、模糊不清，功利主义给人们展示的是机械、冷酷、庸俗和不敬上帝。在西方世界，随着人们对密尔的关注和研究的深入，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人们不再对密尔的思想持一种否定、批判的态度，而是持一种中立、认同的态度对待密尔的作品，以期全面、真实地把握密尔的思想。概括起来，20世纪中叶至今学界对功利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密尔的自由主义思想研究；功利和自由、权利的关系；后果主义视域的功利主义研究；功利主义在当代的新形式；功利与正义的关系问题；功利主义在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虽然密尔的思想在20世纪后半叶以后受到关注和重视，但是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即功利和品格的关系却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关注。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我国学术界逐步掀起研究功利主义的热潮。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西方功利主义的历史梳理；为功利主义正名；密尔功利与自由的关系研究；密尔的自由主义思想研究；密尔功利主义的正义观研究；中国伦理思想史中的功利主义之探讨。关于功利和品格的关系始终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因而成为功利主义研究的一个空白领域。

三、研究视角、思路和方法

在密尔生活的时代，由于工业革命在英国的推进，社会生产力获得巨大增长，当时的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极具现实关切情怀的密尔看到了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社会进步，但他认为这种进步是片面的，缺乏持续的动力。因此，密尔不满足于当时以经济发展为标志的社会进步，他孜孜探求社会进步的内容和动力。密尔认为社会进步不仅包括经济的发展，还包括人发展，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目的；人的发展不仅包括智性的发展，



而且包括德性的发展，品格培养无疑是德性发展的重要内容，而品格培养离不开自由的制度和环境的保障。因此，密尔以自由的制度和环境为前提，论述了品格培养的方法和途径等问题。本书顺着“功利和品格”这一线索研究密尔的功利主义品格观，并通过中国伦理思想史中儒家关于“功利和品格”关系的论述，以期为现代化尚未实现的中国社会民众的品格培养提供启发与借鉴，从而实现社会持续不断的进步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鉴于此，围绕功利和品格这一主线，本书共分五章来完成上述研究任务。第一章“密尔功利主义品格观的形成”主要分析密尔功利主义品格观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其中，时代背景主要指在英国如火如荼地开展的工业革命、自“光荣革命”开始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以及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理论基础主要指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哈奇森、休谟、斯密和弗格森等，功利主义创始人边沁以及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思想。当然，密尔对他们的思想既有继承，又有超越。第二章“功利与品格：理解密尔功利主义的一个新维度”主要介绍功利、品格的概念以及功利与品格的关系。在密尔的语境中，功利和幸福是基本等同的概念。幸福是一个多层次的动态性概念，就层次性而言，它不仅包括物质幸福，而且包括精神幸福；不仅包括个体幸福，而且包括所有相关人员的幸福；不仅包括个人幸福，而且包括社会进步。就动态性而言，不同时代甚至同一个人在人生的不同时期对幸福的理解也不相同。概括起来，品格培养是功利实现的必要条件，功利实现是品格培养的最终目标。第三章“密尔论品格培养的途径”结合密尔独特的受教育经历和其所生活的时代问题，阐述密尔关于品格培养的环境和途径。第四章“功利与自由：密尔功利主义品格观的难题”论述了功利与自由的关系这一密尔功利主义品格观的难题。研究密尔功利主义品格观不能绕开的一个难题就是其关于功利和自由关系的观点。这一部分在界定自由的含义、英国近代自由主义发展的基础上，引入19世纪发生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以丹麦哲学家克尔恺廓尔和德国哲学家尼采为典型代表的个体主义和以来自德国的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为典型代表的集体主义的争论来分析自由和功利的关系，并得出密尔所认为的功利优先的结论。第五章“当代中国语境中的功利与品格”主要论



述密尔功利主义品格观的当代价值。当代中国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和19世纪英国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基本相同，我国面临着和19世纪英国社会相似的社会问题，密尔所论述的品格培养的环境和途径不仅提升了其所在时代的精神高度，有助于英国成功应对现代化的危机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且对我国民众的品格教育和提升时代的精神高度具有重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本书采用如下研究方法：第一，文献分析法。笔者通过阅读古今中外的大量著作和论文，挖掘密尔功利主义思想中功利和品格的逻辑关系以及功利和自由的关系，一方面开启了密尔功利主义思想研究的一个新维度；另一方面为正在向现代化迈进的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民众的品格培养和幸福实现提供启发与借鉴。第二，比较分析法。只有通过比较，事实和结论才会更加明晰、更具说服力。本书通过比较密尔和边沁功利主义思想的异同、密尔功利主义品格观和中国伦理史中功利与品格关系的异同，以及密尔所生活的19世纪的英国社会和当今中国社会的异同，分析了在现代化尚未实现的我国社会民众品格培养的必要性、环境和途径等问题。第三，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相统一法。本书采用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相统一的方法，根据一定的生活经验、时代背景和历史传统概括和提炼密尔的功利主义品格观，从而使本书超越了单向平面维度的视角。同时，本书运用归纳、演绎等方法，对“功利”、“品格”等重要概念进行了剖析和界定，增强了文章的学理性和论证的深刻性。第四，问卷调查法。在论证密尔功利主义品格观的当代价值时，采用了樊浩教授、葛晨虹教授和龚群教授等所做的关于伦理道德的调查报告来进行论证，增强了论证的针对性和说服力。第五，跨学科研究法。本书内容涉及伦理学、哲学、教育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通过密尔的功利主义品格观研究实现了这些学科的有机跨越与整合，拓展了密尔功利主义研究的新领域、新思路。

目 录

第一章 密尔功利主义品格观的形成	1
第一节 密尔功利主义品格观的时代背景	2
一、英国工业革命	3
二、由《大宪章》和“光荣革命”开启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9
三、法国大革命	13
第二节 密尔功利主义品格观的理论渊源	18
一、苏格兰启蒙运动	18
二、功利主义的创始人——边沁	23
三、“美国民主的哥伦布”——托克维尔	27
第二章 功利与品格：理解密尔功利主义的一个新维度	33
第一节 何为功利？——功利概论	34
一、功利、功利主义的含义	34
二、理解功利主义的两个维度	39
三、功利的证明	45
四、现代功利主义的两种主要形式	52
第二节 何为品格？——品格概论	57
一、品格的内涵	57



二、品格的结构	60
三、品格与制度	66
第三节 密尔功利主义品格观的主要内容及得失评价	71
一、密尔功利主义品格观的主要内容	72
二、密尔功利主义品格观的得失评价	76
第三章 密尔论品格培养的途径	81
第一节 密尔独特的受教育经历	81
一、教育和环境对其成长的影响	82
二、青年时期的精神危机	88
第二节 品格何以养成？——品格培养的内容和途径	92
一、品格培养的内容	92
二、品格培养的途径	100
第四章 功利与自由：密尔功利主义品格观的难题	110
第一节 论自由	111
一、自由的含义与类型	112
二、英国近代自由主义的发展——从霍布斯、洛克、 边沁到密尔	115
三、密尔的“消极自由”观	120
四、从政治自由到社会自由	122
第二节 自由与功利之关系	124
一、19世纪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争	126
二、自由优先抑或功利优先？	130
三、密尔自由观的局限性	135
第五章 当代中国语境中的功利与品格	138
第一节 中国儒家思想中的功利与品格	139



一、儒家的义利观——“义以为上”、“见利思义”	139
二、儒家关于功利与品格关系的思想	147
三、功利与品格关系之中西比较	152
第二节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功利与品格关系	157
一、社会转型与现代化	158
二、社会转型中的道德危机及原因分析	163
三、社会转型中的功利与品格	171
第三节 当代中国语境中的品格培养	174
一、品格培养的环境——自由和公正	174
二、品格培养的途径	178
三、结语	183
附录	186
参考文献	188
后记	200

第一章 密尔功利主义品格观的形成

功利主义是在西方乃至全球影响巨大的伦理学流派之一，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德谟克利特的幸福哲学和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中间经过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弗兰西斯·哈奇森、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等的贡献，以及到杰罗米·边沁时，功利主义的完备体系得以初步形成。18世纪下半叶，英国法学家、哲学家边沁受到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哈奇森、休谟、斯密和弗格森等人的启发，提出旨在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学说并不遗余力地把它付诸实施，因此被誉为这一学派的创始人。1776年，边沁在《政府片论》中首次公布功利原理，明确指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正确与错误的衡量标准”（杰罗米·边沁，2010）。与此同时，边沁明确指出无论是“功利”这一名称还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功利主义的目标都不是他的首创，其均受益于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休谟、哈奇森和斯密等。休谟早就提出，在道德的所有决定因素中，公共效用具有首要地位，在公共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就是肯定“人类的真正利益”。虽然休谟由于提出功利原理而被视为功利主义的先驱，但他却未谈到功利的最大限度增长和覆盖，明确提出这一观点的则是哈奇森。哈奇森在《关于道德善恶的探究》中已经使用了后来在边沁那里成为经典的公式——“最佳行为是成就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行为”（埃利·哈列维，2011）。至于自己与功利主义的关系，边沁明确指出，他的独特与创新之处在于根据功利主义学说对现实问题进行分析与批判并积极探索解决之道。在边沁等功利主义者



的积极推动下，英国政府和立法部门致力于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通过《新济贫法》、日益扩大工业区中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选举权、扩大上升的资产阶级表达自我和对国家立法的影响等。可以说，正是边沁等功利主义者的努力，在当时的英国造就了一个功利主义的时代。关于这一点，英国哲学家罗素的看法和边沁颇为相同，即“边沁的功绩不在于该学说本身，而在于他把它积极地应用到种种实际问题上”（罗素，2002）。进入19世纪，在英国如火如荼地开展的工业革命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人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均发生了重大变化，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已经无法解答这些问题和变化，功利主义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就将被时代所唾弃。边沁思想坚定不移的追随者詹姆斯·密尔的儿子约翰·密尔将边沁等思想中的合理部分融入自己的体系中，又结合时代现实发展了功利主义学说。他敏锐地观察到品格培养和功利实现的关系，注重人的思想境界的提升以承载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

第一节 密尔功利主义品格观的时代背景

当代美国伦理学家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在其名著《德性之后》中明确指出：“我则不仅认为，为了确立一种具体的观点是什么，历史的探求是必要的；而且认为，正是在观念的历史性冲突中，在某种特定的背景条件下，任何特定的观点相对于它的特定的匹敌者而言，或者是确立了或者是没有确立它的合理优势”（麦金泰尔，1995）。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不同的时代会给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留下不同的问题，一些具有现实关切情怀的思想家往往比一般人更能敏锐地观察到现实生活的变化并对此做出思考，密尔就属于此类极具现实关切情怀的思想家。在密尔生活的时代，一方面，英国的工业革命在促进英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在社会和道德领域出现了新的问题亟待解决；另一方面，由《大宪章》所确立的法治原则和始于17世纪末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在某种程度上确立了政府须对人民负责并可由人民予以更换的民主制；



此外，爆发于 1789 年、持续了十余年、政权几经更迭的法国大革命对密尔的冲击很大，因为他观察到大革命虽然采用暴力手段推翻了法国的君主专制统治，但却不知不觉地继承了旧制度的大部分“民情”，在旧制度的“瓦砾”上建造新社会的“大厦”，这样的“大厦”缺乏稳固的基础，当然是不牢固的。所以，如何改变民众的思想、感情和习惯以适应新社会的运转，成为密尔尤为关注的一个问题。

一、英国工业革命

1. 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与发展

在密尔生活的时代，工业革命正在英国如火如荼地开展。工业革命是从英国开始的一次巨大的技术革命，是技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它开创了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时代。从生产技术方面来说，工业革命使工厂代替了手工工场，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从社会关系来说，工业革命使依附于落后生产方式的自耕农阶级消失了，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形成并壮大起来。所以说，这次革命是一次技术变革，主要工业相继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以工厂制取代作坊制和手工工场制，结果这些工业部门的产量和劳动生产率均有较快增长。例如，英国的煤炭产量 1700 年为 250 万吨，到 1750 年为 475 万吨，1800 年为 1000 万吨，1829 年为 1600 万吨（Leonard W. Cowie, 1978）。工业的蓬勃发展，使英国深深卷入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作为“世界工厂”，英国的原材料和生活资料供应以及产品的销售越来越严重地依赖海外市场。1740 年，英国工业产值为 2420 万英镑，其中出口额仅为 630 万英镑；1770 年，英国工业产值增为 3690 万英镑，出口额为 1120 万英镑；1800 年，英国工业产值增至 6820 万英镑，出口额为 2350 万英镑（Roderick Floud, Dorland MacCloskey, 1981）。经济的迅速增长，使英国无论从总量还是从人均量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从 1770 年到 1840 年的 70 年间，英国的劳动生产率增加了 2700%，即 1840 年每天生产的是 1770 年的 27 倍”（马克思、



恩格斯，1957），为成为“日不落帝国”奠定了物质基础。

2. 工业革命与英国贫富差距问题

工业革命既是一场生产力迅猛发展的技术变革，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渐形成并壮大起来。一方面，一个人数不多但掌握着社会大量财富的富有者阶层——工业资产阶级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而出现。与当时依靠出身、血统获得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贵族阶层不同，这一富有者阶层依靠个人奋斗获得大量财富。此外，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雇佣劳动大军成为与资产阶级相对立的无产阶级，这一阶级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了巨额社会财富，自己却一无所有，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生活日益贫苦，并受到疾病、失业和饥饿的困扰。当时的雇佣大军生活于城市的贫民窟，酗酒、嫖娼、堕落是这个阶层的常态，这与英国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欣欣向荣格格不入。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财富分配极不合理：1801年1.1%最富有的人占有国民总收入的25%，到1812年1.2%最富有的人就取得35%的国民总收入，到工业革命完成时的1867年，2%最富有的人所聚敛的财富占国民总收入的40%，相比之下绝大多数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却在飞速下降。可见，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社会财富分配日益不公，英国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于19世纪中叶经过21个月深入、细致的实地调研，写作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揭露了工人阶级的悲惨境遇及有力抗争。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伦敦的街头是一个日益扩大的泥塘，在失业时期那里充满了无穷的贫苦、绝望和饥饿，在有工作做的时候又到处是肉体和精神的堕落。在其他一切大城市里也是一样，只有享有特权的少数工人是例外；在较小的城市和农业地区情况也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2012）。实际上，持精英主义倾向的密尔等自由主义者对于无产阶级始终处于一种极为矛盾的两难境地，当新兴资产阶级通过革命的方式反对特权阶层和贵族统治后，民主得以扩大，他们不得不面对新的敌人，就是要在民众进程中获得权利的无产阶级。难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早在19世纪30年代



就不无忧虑地指出“无产者的问题是这样一个会让当今社会粉身碎骨的问题”（托克维尔，2005）。实际上，作为哲学上的激进主义者，密尔极为重视民众政治权利的获取在英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但他又对政治权利日益扩大的民众表现出隐隐的担忧，这也是他所处时代的问题在他思想中的折射。当然，为了控制民主可能的恶，就必须让民众学会现代的政治原则和政治行为，养成必要的习惯和感情，为此，在教育基础上培养民众的品格就成为必不可少的措施。

随着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英国无产阶级越来越难以忍受这种恶劣的经济状况和低下的社会地位，此起彼伏地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从盗窃和毁掉资本家的财产发展到有组织的暴动和罢工以及其他政治斗争，以争取普选权为目的、以便有机会参与国家管理的持续十余年的英国宪章运动即为明证。此外，英国社会犯罪率大大上升，城市存在大量的贫民窟，环境恶劣，疾病蔓延，严重影响英国国民素质。在此形势下，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的英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化解因为贫困问题而可能发生的社会冲突。这些措施主要包括通过《济贫法》、《新济贫法》等对贫民实施救济、加强市政管理、改善工人工作居住条件等和通过全国的慈善学校、主日学校等对劳动群众实施最低限度的教育等。虽然英国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富差距剧烈扩大引发的社会矛盾，化解了可能激化的社会冲突，但是，工业革命期间，由于自由放任思想的指导，政府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贫富差距问题。

3. 利益被提升为人的统治者

——工业革命过程中，欲望和消费主义就像两只无形的大手，把工业革命向前推进。实际上，英国工业革命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利益被提升为人的统治者，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都被归结为商业利益关系。于是，无论是资本家还是雇佣工人，均把物质财富的获取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并把拥有财富的多寡作为衡量人的价值和地位的标志，正如恩格斯所言，“金钱确定人的价值：这个人值一万英镑（He Is Worth Ten Thousand Pounds），就是说，他拥有这样—